

Lingnan University

##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

2023

### 論《1984》中的語言控制

Kei Yau YEU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楊紀悠 (2023)。論《1984》中的語言控制。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考功集2022-2023：畢業論文選粹》。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This 現代文學、文學與電影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二零二二至二三學年

嶺南大學中文（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 〈論《1984》中的語言控制〉

學生：楊紀悠

指導老師姓名：徐剛教授

## 提要

《1984》作為反極權的代表作品，以多方面的禁制塑造了一個惡托邦，警醒世人身處極權之中的可怖。其中，語言這方面常被忽略，但是實際上有著顯著的影響。一些標誌性的詞語例如新語、雙重思想、老大哥等也是廣為人知，正反映了掌權者從語言著手，步步進逼地收窄人們的自由空間，使他們的語言處處受限，而出現人們理智盡失、無反抗之力的情況。因此，本文會透過分析小說中為控制而設的語言特質和措施，及所達到的具體效果，並扣連作者對於現實中的語言環境與極權社會的反思，提出跟現代社會的關聯性。

## 目錄

第一節：《1984》的創作背景 .....	4
第二節：《1984》中語言的極權措施.....	6
1. 科技下的監控 .....	6
2. 控制情感 .....	6
3. 詞語設計 .....	8
4. 剝奪語言的藝術性 .....	10
第三節：《1984》中語言的極權措施的效果.....	12
1. 人民沒有思考能力 .....	12
2. 控制歷史，忘卻過去.....	12
3. 道德倫理衰敗，喪失理智 .....	14
第四節：語言禁制與歐威爾的反思.....	15
第五節：延伸：未來/現代科技與極權.....	28
第六節：總結 .....	20
參考資料.....	21

## 第一節：《1984》的創作背景

法西斯主義在20世紀初有著顯著的地位，歐洲曾有一段時間出現過擁戴法西斯主義的熱潮。可是《1984》的作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因自小受權貴欺壓，所以他一直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支持「反極權主義」，為他的反法西斯主義打下了基礎<sup>1</sup>，也建立了他超越時代而又精準獨到的政治觸覺，成為了時代的先驅者，並得以寫下了被視為政治預言書的《1984》。<sup>2</sup>

歐威爾的時代背景無疑跟他的著作中語言控制的創作有莫大的關係，《1984》的出版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而書中的新語（Newspeak）和第三帝國語言有著許多相似之處，例如一致性、極端化修辭、較多指示性修辭等<sup>3</sup>，二者也在系統化地將思想統一以縮小思想範圍。而且，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開始對政治宣傳語進行反思。根據《政治與英文》（*Language and Politics*），基本英語（Basic English）的創始人查爾斯·凱·奧格登（Charles Kay Ogden）與艾弗·阿姆斯特朗·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當時就深信宣傳在戰爭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sup>4</sup>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出現了許多煽動人民的宣傳標語，他們聯合報章的力量，以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內容說服公眾參軍。並會囚禁打壓政治意見不同的民眾，導致社會上的聲音一面倒。受煽動而參戰的美國人在戰後深感不滿，也讓眾人反思宣傳的可怖威力，以及宣傳性語言的散播與戰爭的關係，因此造成了一陣「宣傳焦慮」的風氣。而當時的廣播作為嶄新科技興起，加上政治上的陳腔濫調，同樣加劇了這股「宣傳焦慮」。受著戰爭的大環境影響，歐威爾在書中也融入了相關的元素，探討了這些語言的運用和傳播工具所引發的問題。除此之外，奧格登和瑞恰慈亦深信抽象詞語的誤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為了和平，他們設計了基本英語。基本英語是將詞彙的數量縮小到最低限度，原本只有500字，後又增加至850字；並以新原則格式化和簡單化英語。<sup>5</sup>歐威爾雖然一開始擁戴這種做法，但是後來他卻意識到基本英語的一體兩面，不但寫了

---

<sup>1</sup>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張弘瑜譯：〈歐威爾是歐洲的良心也是受苦英雄〉，《我為何寫作》〔Why I write〕（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16-17。

<sup>2</sup> 同註1，〈歐威爾是歐洲的良心也是受苦英雄〉，頁20。

<sup>3</sup> 黃華：〈納粹語言如何顛覆智識？--評克萊普勒《第三帝國的語言：一個語文學者的筆記》〉。《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145期（2014年10月），頁123-131。

<sup>4</sup> Joseph. *Language and poli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16

<sup>5</sup> 同註4，頁116-118。

〈政治與英語〉批評簡化語言，還加入了基本英語的特質，創作了《1984》的新語，反省語言和政治的關聯。

## 第二節：《1984》中語言的極權措施

### 1. 科技下的監控

雖然在歐威爾的時代，科技還不足以完全監控國民，但當時的中央廣播讓他預見到科技將成為獨裁者的助力；因而在「1984」的未來世界中，他創造了「電屏」這種新科技去描繪一個監視重重、有口難言的國家。電屏的基本功用為二，分別是傳播和接收。傳播的功能基本上與中央廣播相似，透過不斷地復述、傳播極端化的語言、使用激昂的語氣及篩選廣播內容，強迫人民接收國家所編撰的資訊，從而潛移默化地影響他們，使他們甘心樂意地歸順政權。乍看之下，電屏與一般的資訊傳播渠道無異，然而在老大哥的統治下，除了統一性的內容，電屏還播放名義上愛國實則具煽動性的血腥影片、仇恨兩分鐘、每天強制性早操等，成為了煽動仇恨的工具。國家亦早已監控了所有資訊流出的管道，讓其中所有的內容都是為了服務黨的政治理念，因此黨員也被剝奪選擇資訊的權利，所接收的訊息越趨單一極端，而電屏的存在也加劇了這種情況。

更甚者是電屏的接收訊號功能，它將監控更上一層樓，逐步控制了人們的言語輸出。電屏可以紀錄所有的聲音畫面，將一切披露，使民眾失去了思想、言語和行為的隱密性。即使外出也有隱藏麥克風錄下他們的對話內容，只能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儘管思想警察未必無時無刻都監視著他們，但是基於人們的不安和恐懼，他們會陷入無間斷的自我審查中，因而自我噤聲，就能造就一個難有反對意識的環境。例如溫斯頓在電屏前就尤其拘謹，甚至荒唐到相信背部也會出賣他的想法、心跳聲也能被聽見，而正對電屏更是必須要呈現「平靜又樂觀的樣子」，又提到「一個閃爍的眼神都可能出賣你」（頁19），他們的恐懼就如抱薪救火，反而讓這種極端的監控越演越烈。

### 2. 控制情感

在《1984》中亦展示了情感之於極權的矛盾性。一方面，大洋國會大力煽動情感，但是另一方面卻會嚴格監控人們的情感反應，以達到統治的平衡。而有此複雜性正因為集體仇恨敵人的情感是極權統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但是同樣地與政治無關的情緒會影響效率、逐步建立獨立思考及勢力，所以是需要被打壓直到完全消滅的。

事實上，極權煽動情感可以達到三個方面的政治目的。

首先，有助他們以指示性語言控制人民。指示性語言其實本身就有情感成分在裡面<sup>6</sup>，透過這份感染力去影響人做相應的事情。他們會以許多方式營造情感共鳴，所以很常用尖叫、大喊等情緒化的方式表達，又比如在憎恨週的第六天他們會有「遊行、演講、吶喊、歌唱、旗幟、海報、影片、蠟像一應俱全」（頁207），這些行為更包含了語言與非語言的感動方式，同樣會引起人們的感情效用<sup>7</sup>，像對於政黨的熱情和歸屬感等，將人民導向所希望的結果。此外，他們更是會用許多隱晦的指示性語言暗中催促人們參軍，例如在勝利時透過電屏向人民講「讓這場戰爭朝著最終勝利跨進相當的距離」（頁336）這種個科學無法證明的話<sup>8</sup>，但是卻足以影響人們的意志，讓他們相信勝券在握而參與其中。

第二，是滅絕人性。煽動情感的行為，在極端的情況之下，會反常地令人喪失良心。以納粹為例，當時因為科學分類是直到18世紀中葉才出現的概念，所以人們對於這種理性概念並不熟知，反而情感作為人類本能，加上第三帝國又愛鼓吹順從自己的情感，使他們漠視道德感地反感和厭棄外族人<sup>9</sup>，直接導致反猶太人主義成為主流。由於情感是飄忽不定的，難以作指標，所以很容易就會蒙蔽了理性，助長仇恨滋生。在大洋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兩分鐘憎恨時間，大部分人在只是聽說了所謂的「人民公敵」時便展現了非同尋常的激動情緒，造成不自控的憤怒嘶叫、上竄下跳、喘不過氣等行為，甚至連有覺醒念頭的主角也會無意識地跟從人群叫喊並踢椅子。所以文中指出「『兩分鐘憎恨時間』的可怕之處並不在於你必須參與，正好相反，是你不可能置身事外」（頁29）說明了放任情緒能輕易能形成集體行仇恨，凝聚國民，讓他們失去理性判斷。

第三，是神化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治，他們會宗教化政黨，並神聖化老大哥，讓人盲目相信和跟從。真相部會修改文章和報紙，以建立老大哥能預測成真的形象，成為人民水深火熱中的依傍，自然發了狂般崇拜他。而且他們的政治理念是擁有宗教一

---

<sup>6</sup> 塞繆爾·早川（Samuel Hayakawa）、艾倫·早川（Alan Hayakawa）著，柳之元譯：《語言學的邀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105。

<sup>7</sup> 同註 6，頁106。

<sup>8</sup> 同註 5，頁104。

<sup>9</sup> 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著，印芝虹譯：《第三帝國的語言：一個語文學者的筆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173。



般的排他性的，所以詩人艾波佛才因為寫了「神」在詩中而被送進牢裡，因為老大哥本該是唯一的信仰，所以不該使用「神」這種能聯想到「上帝」、「神明」的詞。另外，在記錄中所有科技發明都是由大洋國所研發的，讓黨員對國家心生敬畏，漸漸形成一個宗教。因此，在兩分鐘憎恨時間之後，老大哥只需要講兩句鼓勵的話，就能使人重振旗鼓，民眾更是稱他為「救世主」和埋首向他祈禱。

但是《1984》的極權比納粹的更加嚴格控制人們的感情，因為完全殲滅他們的情感才是極權的最終目標。以賽姆為例，他在與溫斯頓聊天的時候展現了對於新語的熱愛和精湛透徹的理解，剖析了新語縮減思想的真相。賽姆此言不但披露了黨的不堪，還反映出自己的批判性思考，正是違背了黨的旨意。雖然賽姆現在對於當權者仍懷著一份狂熱，但是難保他在這份獨立思考下形成反動思想，危害政權，所以必須除掉他這個潛在威脅。歸根究底，比起狂熱的信徒，極權者最需要塑造的是完美的追隨者，不用思考和感覺，只需要一味跟隨。<sup>10</sup>

另外，控制其他感情也是十分重要的，他們需要抑壓所有與其政治目的無關的情感，因為黨服務、對黨的熱愛本該是他們的全部，是一種壟斷性的情感。就像納粹時期，在家庭告示中不能為孩子的出生感到喜悅，而應對於活在「最偉大時代」感到自豪<sup>11</sup>，所有的感情也是要建基於對於政權的崇拜。《1984》更是對於其他感情有嚴格的監控，不但與納粹一樣，婚姻和性行為只是為了延續後代，為黨提供生產力，連表達愛意這種人類本能也是不被允許的。因而當茉莉亞給他遞「我愛你」的紙條，溫斯頓卻將其形容為有犯罪意圖的紙條。而且大洋國亦設立階級和舉報等制度以分化、渙散了人群，以致難以建立關係。因此，即使在真相部中雖然共事多年，但是「當中有十幾個人溫斯頓甚至連名字都不知道」（頁57），可見人與人關係之疏離。由於建立關係容易形成勢力，所以極權統治者透過語言中的情感控制削弱家庭、情人甚至朋友等關係，讓黨員失去連結，更能將一切反動的可能性扼殺在搖籃裡。

### 3.詞語設計

首先，書中黨會使用模糊的法律和詞語，創造以政治為目的之抽象名詞。臉部犯罪就是一個例子，單憑字面是難以理解的，然而實指臉上展現有謀反意圖、異常的表

---

<sup>10</sup> 同註 9，頁245。

<sup>11</sup> 同註 9，頁116-117。

情，其中臉上抽動和焦慮神情等都是危險的面部表情。但是此字實則並沒有明確的標準，單單作出不適當的表情即會招來殺身之禍，而「不適當」的界線和定義也是毫無準則的。事實上，虛無的字詞更易涵蓋更多範疇，存在更多彈性空間，可以隨意定罪；因而達到人治的效果，成為掌權者鞏固政權的工具，而非保障人民的律例。同樣地，「犯罪思想」也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本身一個人的思想是難以輕易窺探及證明，所以被當作犯罪的憑據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另外，「雙重思考」也是在《1984》極具標誌性的新語，該定義為「同時支持兩種相抵的意見，明明知道兩者互為矛盾，卻兩者都相信」（頁51）；表面上是對不同思想的包容，然而只是為了掩蓋國家撒謊而致的矛盾和不合理，教導他們盲目接受並相信一切的資訊消息，黨員就會習慣對四周事物漠不關心，漸漸失去批判性思考。因實則對錯都不重要，他們只需要民眾無條件地聽命於黨，並在腦海中自動粉飾一切黨不合理的謊言，這才是雙重思考真正的涵義。在歐布萊改造溫斯頓的時候，他就直言能靠著雙重思想設計出兩套天體運行系統，溫斯頓頓時明白黨給人們灌輸智識的過程，已經抽乾了他們腦中的理智和真正的智識，且這種思維能不斷自圓其說又或自欺欺人，鞏固了這個荒誕的政權。

第二，是詞語閹割。為了讓人民的行為符合黨的規範，他們會刪減很多意思相近、不常用的字，並排除引起反思、反抗意識的字詞或詞義，就能切割詞語之間的關聯性，消滅遐想和延伸的空間。譬如「好」足以涵蓋「優異」、「卓越」等字，因而後者在新語的原則下都沒有了存在的必要。新語的用字單一乏味，而人們也不會絞盡腦汁去尋找最貼切具體的字詞，因為字典裡已無其他選項，講話表達成了一個不需要思考的過程，相應地聆聽也變得沈悶無趣。而當刪除政治敏感字詞後，人們就難以使用近義詞表達，而這種「異端思想」的詞語就會徹底消失於世。人們失去了對這些概念的認知，久而久之人民也會失去了反抗意識，如同語言相對論中提到的概念。其中提到的例子就是剝奪了「自由」（free）「政治上自由」的意思，只有免除的意思。因而，就算有反抗者也無法用精確的詞彙引起共鳴，提高了反動的門檻。此外，發音較長及不好唸的字詞會被簡化，這些縮寫讓字詞跟原字大相徑庭，人們就會漸漸忘卻字源，就不會認真考究字詞背後的意思，詞語就會成為沒有規律但是擁有意思的符號，就能達到他們要扭曲語言的目的。到最後人們只會鴨語（duckspeak），大有雞同鴨講、言語不通的味道。如文中就提及真相部在新語名為「真部」，因為縮減字詞的過程往往會丟失字源的關聯，當找不到字與意思的關係，字詞只剩下空殼，人們根本不

明所以地說話，只不過是人云亦云，所以久而久之他們就不會知道真部代表真相的意思。而且，大洋國的極權管治只在乎語言最根本的用處，並只以最基本的實用及政治價值去衡量語言詞彙的存在價值，他們不但不在乎文化和民族的長遠性，更希望用以削弱語言的使用和民智，因此只務求刪減縮窄語言範圍至達到最基本的溝通即可。

第三，為改造詞語，他們會將詞語道德化、政治化、美化和二元化，讓詞語脫離其原意。因為他們意欲從文字著手植入歸順於黨方為正確的價值觀，去除個人主義，以黨為第一優先的思考模式和生活方式。「好思想」正是一個例子，其意思是「一個人天生就篤信黨規，沒辦法有邪惡思想」（頁154），這種抽象名詞就是道德化了支持黨的思想，將相同政治立場的思想直接等同於「好」，鼓吹信奉黨規，以字詞潛移默化影響他們的思想。還有「好性」，就是以為黨提供勞動人口為目的的生育，明明放在現實生活中是十分泯滅人性、扭曲的事，但是卻被包裝成值得鼓勵的事。還有，他們將所有殘酷不仁、弄虛作假的事物都以正向的字詞命名，試圖去掩蓋血淋淋的事實。比如負責發布杜撰的消息的部門名為真相部；負責軍事戰爭的卻名為和平部；執行嚴刑峻法的則為仁愛部；以經濟事務為由剝削人民的就是豐隆部。如同第三帝國中將「集中營」稱為「音樂會營地」，以「出遊」代替「被捕」，用常見的詞語取替就會「令人麻木地日常化」，失去原本殘酷的意味。<sup>12</sup>而且，他們新語其中一個簡化詞語的原則是在形容詞前加上un、im作開頭，就能消滅反義詞，只餘下很兩極的字詞，讓語言更非黑即白，削弱了對於灰色地帶的反思，達至人們思想單一和機械化。這種思維很符合國家的軍事目的，黨員心中只有好壞和敵人友軍，不會去細究其中千絲萬縷的關係，只需要殲滅黨的眼中釘和聽令高層，易於操控和管治。

語言是人生中的必需品，所以透過詞語的改造，就能無聲無息入侵他們的想法、改造他們的思想，像納粹時期的情況，「通過那一句句的話語、那些常用語、那些句型潛入眾人的肉體與血液——通過成千上萬次的重複，將這些用語和句型強加給了大眾，令人機械地和不知不覺地接受了下來」<sup>13</sup>。

#### 4.剝奪語言的藝術性

---

<sup>12</sup> 同註 9，頁185。

<sup>13</sup> 同註 9，頁7。

大洋國作為一個極權國家是十分忌憚藝術創作的，為了製造一個思想禁制的地方，所有的文獻資料和紀錄都需要審核校對，以確保只輸出單一的語言風格和思想。因為缺乏多元的思想、劇情，只為宣傳他們的政治思想，加上訂立了許多禁止藝術創作的規定，所以這種一致性就會扼殺藝術性。其中，硬性規定就包括不允許黨員唱兒歌。在書中多次有歌謠的出現，每一次都是一針見血，並帶有預言或者啟發性，例如「枝葉茂密的栗樹下，我出賣了你，你出賣了我」講述了情誼在暴政下的脆弱，也有「他會唱：蠟燭帶著光亮，陪著你上床。屠夫帶著斧頭，砍下你的頭。」講述了一種溫水煮蛙，在表面安樂中殘忍地死亡的光境，將溫斯頓他們所面對的情況如實反映。這些歌謠通常也是由人民所寫，影射現實，抒發他們對於政府和社會的感想，但是往往這些真相會刺痛到當權者，並擔憂這股藝術所凝聚的力量會動搖到自己極端而不穩的政權，所以自然會被抹殺。不同於無產階級能隨意吟唱歌謠，黨員只能唱政府所創造的詩歌，內容也只是為了服務政治宣傳的目的，所以對於押韻並不講究。溫斯頓在獄中曾與詩人艾波佛相遇，他就是為了押韻編排了「神」在詩歌中，而受到詬病並被拘捕。作者雖然用沒頭沒腦去形容這位詩人，但是他卻是書中少數擁有思辨能力的人，他提出了英語發展與英語押韻之間的關係的論題，在現實中也具有探討意義。但是大洋國正是害怕這種藝術性會催生發散性思維，從而意識到所身處的極權社會種種的不合理和不人道，撼動了黨的權威，因此不但囚禁詩人也更嚴厲監管這些詩歌。他們亦會把詞語的重音規律改變，讓他們講話內容空洞，難以影響別人，因此文中描述宣傳時就算換了一個憎惡對象，民眾還是毫不在意。因為他們只是受演講者激動澎湃的情緒影響，而非認同他乏味的演講內容。

### 第三節：《1984》中語言的極權措施的效果

#### 1. 人民沒有思考能力

由於環境中只有一面倒的聲音，而反對的聲音則過於微弱到幾乎完全被抹殺，因此僅剩的清醒者也會反覆自我質疑，無法判斷自己的記憶有否出錯。又由於令人關係疏離的機制和嚴密的監控，所有人都在單打獨鬥，在無盡的猜疑和不信任中掙扎，難以有任何異心。在黨控制新聞、宣傳等所有資訊時，他們編織了無數的謊言，成為了一個「勝利美好的國家」，如同戈培爾效應一樣，久而久之這些孤獨的革命者的懷疑要麼隨著時間逝去，要麼被拘捕以酷刑讓他們心服口服。在如此的環境下，人們自然都盲信一切被黨所灌輸的觀念。

長久沈浸在這樣的環境甚至讓他們生出順服的肌肉記憶，比如一聽到軍樂便失去表達能力，達到精神操控的程度。連文斯頓他作為真相部的人員，雖然會日常修改公文，然而當他在筆記本能隨意抒發自己的感受時，只會不斷重複寫「老大哥下台」一句，具邏輯性的反抗思想，切身達到了有反抗思想也無法訴之言語的效果。當溫斯頓和茱莉亞在藏身之處自由講話時，他只能說「我討厭純潔、善良」這種沒有邏輯和實際意義的句子，用簡單的語言表達對於老大哥制度的不滿，而這正是語言監控的效果。同樣地，溫斯頓在表達時一直都找不到合適的詞，更被歐布萊恩糾正不是唯我論，應該是共同唯我論，顯然出現了無法清晰表達、選擇適當用詞的情況。呼應了雙重思考中所提到除了黨灌輸的智識以外，腦子空白的狀況。

因著缺乏娛樂活動，黨員最喜歡的部分是工作，並形容為可以好像做數學題一樣忘我。在沒有其他空餘去拓展自己的興趣的情況下，讓他們更容易被管治，並能全心全意投入黨務，達到「去我主義」。因此，黨就建立了一個厭棄興趣的環境，若果讀太多書、跟音樂家、藝術家交流，就會落得敗壞名聲的地步。雖然大洋國很常舉辦討論會這些看似很激發思考的活動，實則只是要佔據黨員的時間和思考，也是一種時間剝削的手段。而且每個人說話因要符合規定，也毫無內容和創意，講來講去也是一樣的話，根本沒有必要傾聽，就像人偶一樣。因而溝通成為了一個無聊、無得益的活動，反動的言論難以組織和散播。黨員的溝通也陷入了惡性循環中，在沒有思想和缺乏溝通中不斷敗壞下去。

#### 2. 控制歷史，忘卻過去

克萊普勒的民族學家朋友阿道夫·史巴默（Adolf Spamer）稱如果把發表刊物和學說的聲音統一，並到處說教之後，世界就會相信沒有世界大戰的發生<sup>14</sup>，而當時在第三帝國的資訊壟斷就正正印證了這個說法。同樣地，在《1984》中，黨有隻手遮天的能力，所以課本、電報、演講甚至是過去的紀錄都被竄改，老人在清黨行動中被消滅，大洋國高官讓謊言成為歷史。歐威爾創作記憶洞亦意味著人們活在謊言的世界，違背黨心意的真相將被拋進洞裡被火吞噬。溫斯頓作為真相部的一員，他亦負責改寫紀錄，使黨不至於失信於人，例如更改紀錄裡巧克力配給的承諾。現實的骨感讓昔日的美好成為了似真似假的泡沫，在無法討論自證的情況下，人們根本分不清虛幻和現實。大洋國所塑造的世界成了他們唯一的認知世界。溫斯頓在這個時間、資訊沒有規律、只是按黨意思運行的世界，自然是腦袋混亂，他無法記起童年的倫敦、國家的名字，就算是比較近年發生的事情，例如何處購買筆記本、不確定是否1984年等，甚至他們大洋國一直的敵人是誰也十分模糊，說明了語言操控造成了一個隔絕的世界。儘管像溫斯頓的人對於黨發明一切抱有懷疑，但每個人只能憑著自己矇矓的記憶去分辨，如溫斯頓所想「唯一反對這個說法的證據就是你骨子裡無聲的抗議」，在這種孤立無援的狀況下人們很容易便會陷入自我懷疑和放棄求真。譬如主角他雖然發現舊報紙殘骸能證明三位叛國賊的認罪自白是謊言，卻又因他的懦弱膽怯而沒有留下紙片，但事後跟茱莉亞提起，她也只是淡淡地說就算把證據留下又能怎樣，根本難以說服別人，更會招來殺身之禍。溫斯頓也曾想方設法接觸酒吧老人和查靈頓，可是仍是對過去一無所知。不但如此，他們對於身邊的人也難以判斷別人是敵是友，縱使溫斯頓和茱莉亞有反抗的意識，但是他們卻積極參與建黨活動又先拔頭籌在最前線賣力喊著要處決反動份子、詛咒著葛斯登，根本難以分出端偽。也正因如此溫斯頓才會上了歐布萊恩的當，以為他是兄弟會的一份子，跟自己是一伙的，最後反而落實了他叛賊的身份。在這看不透真偽的世界，能有多少人會被喚醒並奮起反抗的未知的，所以在鐵房子中無人敢吶喊，自然醒悟的人少之又少；他們也難以群起攻之、背水一戰，久而久之就只會縱容極權國家無限壯大。

而老大哥之所以需要改寫過去，讓他們徹底拋棄過去是因為只有抹掉更美好的生活，他們才能繼續忍受自己非人道的的生活。溫斯頓雖然記憶紊亂，可是也有提及顯然過去有一段時間是過著和平的生活，並知悉生活難以忍受是因為曾經有更舒適的生

---

<sup>14</sup> 同註 9，頁109-10。

活。大洋國的統治會抹掉自己失信的紀錄和歷史，將人們改造成金魚般七秒的記憶。所以縱使上個禮拜的配給是三十公克，國民還是會接受甚至感激巧克力的配給「提高」到二十公克的新政策。

### 3. 道德倫理衰敗，喪失理智

在這個語言環境之下，情感的煽動激化了他們的仇恨之心。在資訊封閉單一的世界，連成年人也難以保守自己的內心，更莫論心智不成熟的小孩。小孩接收到的電屏訊息、報紙對於政治犯的批判，細緻到日常使用的語言都深受荼毒，亦從來沒有接受過理性的教育，更加對於在位者深信不疑。黨籍此系統性地培養孩子成為自己的線人和軍隊，經常公開表揚孩子舉報親生父母同情黨以外的人，並鼓吹這種違反人倫關係的風氣，讓社會人心惶惶。例如帕森斯的孩子玩抓思想犯的遊戲時充滿憎恨和認真，言行間滿是歹毒和偏激，亦對於血腥恐怖的絞刑有著扭曲的憧憬。帕森斯作為成人也不遑多讓，他愛黨狂熱至極到失去理智的地步，後來他卻被自己的女兒舉報，即使不清楚自己有沒有犯罪叛黨，可他非但不埋怨她和黨，還為此感到驕傲。同樣地，大洋國的極權監控也包括施極刑分化黨員，導致背叛與恐懼叢生。儘管茉莉亞是少有的覺醒者，她有骨氣並厭惡黨，更是曾承諾不會背棄溫斯頓，然而她在審問初期已經棄械投降，出賣了溫斯頓，應驗了歐萊布恩所提的因精神改造而順服極權的說法，可見《1984》的極惡在於完全泯滅人性的光輝。

#### 第四節：語言禁制與歐威爾的反思

首先，歐威爾他展示了科技的進步會促進極權的控制，而人民也因資訊發達而扭曲敗壞。在文中提出科技讓他們能不單有言語的監控，還能從精神層面上改造造反者，達到更全面的控制。而其中則是用了電屏、麥克風等，呼應了當時新聞和廣播的操控足以控制人民精神的反思。以前在這些電子設備還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人們主要受到環境影響，而資訊也不流通，掌權者更難完全操控言論，或者監控人們的想法。譬如在秦朝的時候，雖然有焚書坑儒，但是卻難以阻擋人民暗地討論朝政、私底下將書藏於牆與牆之間和背誦書籍等方式繼續流傳學說。但在電屏之下，這一切的行為都將會在政府的監控下無所遁形，自然禁書就會難以流傳下去，達到噤聲的作用。而在歐威爾的年代，廣播是新興的潮流，這證明科技進步的設備讓當政者、商人有意散布的消息無處不在、無孔不入，在耳濡目染之下人們就盲目相信了煽動性的內容，進而仇恨敵人和參戰<sup>15</sup>，使人們思想越趨單一。對此，歐威爾則在文章中，評價電報通訊讓政府掌握的事物越來越多，而人們獨立思考的空間則越來越小。<sup>16</sup>而這就是在語言方面體現到大政府小市民的概念，正是違背了他所推崇民主社會主義。另外，他亦批評報章是虛假的樂觀主義，只為了博取目光和提高銷售而譁眾取寵<sup>17</sup>，但是這些媒介卻正是民眾了解社會和世界的渠道。當人們沒發現自己所吸收的資訊已經透過科技監控被過濾控制的時候，就會無意識接受一切的資訊，無形間人們的思想就會歸一，而控制就成為了一件易事。因此，隨著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極權將為由肉體的禁錮進到限制思想的自由，最後到塑造出無意識的不自由和統一的思考模式。

第二，在面對政治災難時，歐威爾將期望寄望托予底層人民身上。在《1984》中他對於黨人的描述總是失去理性的，反而無產階級卻是鮮活、樸素但率真，他們會唱民謠、生活自由。在電影院的場面，他們給小孩播放猶太母子在戰爭中被殘酷殺害的戰爭片，而黨員對此滅絕人性地拍掌以示欣賞，只有無產階級階級的女人指責他們不該放映這種電影給孩子觀看。這一幕被溫斯頓紀錄在日記中，亦在他的內心中埋下了無產階級是希望的種子。而現實中歐威爾對於他們充滿期望，這份信心其實是源於他們仍使用原始的英語和他們擁有更多的自由。因為無產階級仍在使用舊語，也更少使

---

<sup>15</sup> 同註 4，頁116-117。

<sup>16</sup> 同註 1，〈獅子與獨角獸：社會主義與英國精神〉，頁101。

<sup>17</sup> 同註 1，〈政治與英語〉，頁117。



用歐威爾不欣賞的外來語和短語，所以他們成為了保留舊語和多元的思考模式的希望。正正是無產階級卻反而避免了日常用字的荼毒，就像「第三帝國語言的飲用水被毒化了」<sup>18</sup>，但他們因制度的不公反而逃過一劫，可以避開隱晦指示性語言的陷阱。另外，印度獨立問題也讓他反思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他也曾反思若沒有發聲的途徑、反對分子能被瞬間殲滅的話，就像甘地若在蘇聯中也難以作為。<sup>19</sup>因此，對於他來說有著這份自由的無產階級才是希望，然而他們還是需要覺醒，在文中則沒有任何覺醒的徵兆，所以溫斯頓才評論稱，只有他們覺醒並把發言的權利用於更重要的事上面，他們才有希望。

第三，是對於基本英語和當時英語環境的反思。歐威爾在1942年至1944年本來是擁戴基本英語，直到1945年他則反過來開始質疑基本英語，他在文中就指出過「語文亦能腐敗思想」<sup>20</sup>。歐威爾本身認為「抽象語言不具任何意義」<sup>21</sup>，因此十分支持用精煉語言表達，他的主張實則跟奧格登與瑞恰慈所創的基本英語理念相似。而且基本英語又承載著成為國際的第二語言的目標<sup>22</sup>，本意是好的。然而，歐威爾意識到詞彙的減少，就會減低斟酌用詞的思考，也減少了思考的維度，因而達到了極權統治者縮窄思考範圍的目的。因此，他以基本英語為藍本，創作新語，指出語言字詞的減少會導致無意識地收窄了思想的空間，反而是本末倒置，向普羅大眾展現出其成為獨裁者極權管制工具的隱患。

而且，在這個看似進步實則退步的語言改變過程，也讓歐威爾正視當時英語體制的種種不足。他意識到人們的愚昧懶惰，讓英語益發偏離原意和失去藝術價值。當時人們愛用片語，當然片語用得精準固然能讓文章生色不少，然而他們卻憑著慣性濫用片語、形容詞，令隱喻的原意被扭曲，浮誇的文字只會言過其實、無病呻吟，難以觸動人。除此之外，為了不用竭力思索完美詮釋的字詞，他們加上-ize等胡亂造新字，又愛用阿丁文、希臘文，讓整句難以營造出鮮明的影像，語言就變得空洞無趣。英語使用者他們只是在盲目復讀，沒有消化沒有理解；他們創造抽象字詞，並擅自將法西斯主義等同於邪惡而不考慮內裏的核心，就如同詩人將「肺結核」和「浪漫」無意義地

---

<sup>18</sup> 同註 9，頁90。

<sup>19</sup> 同註 1，〈關於甘地的幾點感想〉，頁65。

<sup>20</sup> 同註 1〈政治與英語〉，頁188。

<sup>21</sup> 同註 1，〈政治與英語〉，頁188。

<sup>22</sup> 同註 4，頁118。

聯想一起，反而忽略了事物的本質；更甚他們因著懶惰創造短語，例如真相部縮寫成真部般不知所云，漸漸扭曲字詞，字詞的內涵慢慢被掏空，單純地成為了表達的代號，失去了感情色彩。這種對文字馬虎的態度讓新語誕生於現實世界，雖然本意並不是要控制思想，卻同樣讓文字失去生命力，且只為效率服務。

日常英語以外，政治用語亦是歐威爾所批判的，因此在小說中他創造了許多標誌性的詞語。例如「雙重思想」可以對應英國人對於大英帝國的雙重標準，斥責著他們的不理性。歐威爾尤其唾棄政治用語不真誠、過於抽象和經常美化災難和不幸，而他在文中也極端地表達了政治用語所導致的問題。譬如大洋國有許多政治詞彙定義模糊，包括「面部犯罪」、「思想犯」等，而且他們把字詞道德化，大多加上「好」、「犯罪」以定性違背黨綱目的行為。他又在文章中曾提及「那些政治性的文章，似乎都被迫遵循一種沒有生命力及互相模仿的型態」<sup>23</sup>，正是與真相部杜撰文章時需要遵守許多的規則、如同機械人一般修改的情境相近。他又指政治家機械性地重複，消磨群眾的意志，所以在文中也曾描述政治人物集會中發言空洞至極，即使換了演講稿上的姓名依然能繼續的情況，使無論是講者還是人民都沒有熱情，逐漸達到政治同化的目的。而且他們會為站不住腳的立場而爭辯，因自知理虧，便只用委婉、避重就輕甚至美化扭曲真相的言辭來混淆視聽。歐威爾筆下老大哥這股勢力為了鞏固他們的政權，用語言編織無數的謊言，應驗了他的觀點：「所有的政黨都一樣——都是為了以假亂真、讓殺戮變得值得尊崇，使空話聽起來煞有其事」<sup>24</sup>。因此，歐威爾藉此黑暗衰落的極權國家的故事作警惕，警戒人們「讓意思選擇詞彙」，並把語文當作表達想法，而非封閉或抑制思考的工具、政治的遮羞布，講誠實、言之有物的話，方能改變當下的亂象。

---

<sup>23</sup> 同註 1，〈政治與英語〉，頁185。

<sup>24</sup> 同註 1，〈政治與英語〉，頁192。

## 第五節：延伸：未來/現代科技與極權

歐威爾所身處的年代科技固然沒有《1984》般先進，但是他能意識到廣播的宣傳對人們將造成極大的影響，已經極為敏銳。這種資訊的灌輸其實跟我們所知的單純曝光效應的有異曲同工之妙，當見的次數多就會因著熟悉感而產生安全感，從而增加好感度<sup>25</sup>，因此大量偏頗的消息充斥著人的生活圈，也會左右他們的認知和觀點角度。就像《第三帝國的語言》中提及不少德國民眾雖然同情猶太人的遭遇，但是「猶太豬」等冒犯性的稱呼仍會脫口而出。<sup>26</sup>加上報紙是人民少數可以接觸到社會消息的渠道，而廣播亦是剛發明的新科技，他們並沒有防範辨別的意識，只是視其為權威的言辭，因而輕易被煽動，陷入政治家與商業家的陷阱中。不少學者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歐威爾就是其中一員，他深知科技的方便只會促進集權的擴張，因此在書中他從縱向的角度出發，以1984年的未來世界創作一個科技更發達的世界，裡面描繪了電屏、記憶洞等先進的電子產物。他在幻想的世界展示了更厲害的科技只會剝奪人們的自由空間。此文學作為一個幻想性的作品，亦讓讀者反思，活於1984以後的人們雖然在科技更發達的時代中，但是否被剝奪了更多的自由和隱私。

在這資訊氾濫的時代，人們接收的資訊不止文中的廣播、報紙，手機、電腦、無處不在的廣告牌和電視屏幕已經充斥著人的生活，跟人建立了不可分割的關係。因而控制資訊曝光或者主流言論所帶來的效果也會比以往更深，更容易被有心人所利用。例如一家由美國推出的社交平台Parler，他們於應用程式商品稱自己是一個以言論自由為先、觀點中立的社交媒體。<sup>27</sup>但是卻被指平台會大量推薦美國右派評論員的帳戶給予新用戶，及刪除自由派的言論<sup>28</sup>，或有偏頗、誤導之嫌。不但如此，科技的進步亦加速了資訊的流通，讓一切的訊息能夠輕易地傳播到世界各地，然而也讓能挑撥、仇恨等傷害性的言論更廣泛地流傳。在緬甸自昂山素姬當政後，電訊科技正式進入原本封閉的緬甸，Facebook作為少數可以使用緬甸文的網站成為了當地主流，但伴隨的卻是種族仇恨的加深。由於Facebook監管的人手不足，和緬甸人對於新科技的不了解和全盤接受，導致平台充滿了各種攻擊已被剝奪了緬甸公民身份的羅興亞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文

---

<sup>25</sup>Zajonc, R. B. (2001). Mere Exposure: A Gateway to the Subliminal.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 (6), 224 - 228. <https://doi.org/10.1111/1467-8721.00154>

<sup>26</sup> 同註 9，頁193。

<sup>27</sup> Parler - Apps on Google Play. (n.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parler.parler>

<sup>28</sup> 李志中〈言論自由的叢林法則（上）〉《思想坦克》，2021年1月25日。摘取自：<https://www.voicettan.k.org/single-post/2021012501>，摘取時間：2023年2月21日，16：00

章。<sup>29</sup>在監控網絡煽動性言論問題的同時，亦有群眾擔心互聯網成為有心人控制資訊的工具，網絡禁詞反倒成為掌握消息傳播的藉口，削弱了言論自由的權利。在2018年，媒體報導Google正秘密開發中文的自我審查搜索引擎，用以過濾人權和宗教相關等網站，惹員工集體抗議，唯恐他們的工作正協助公司打擊言論自由。<sup>30</sup>由此可見，歐威爾認為資訊的充斥恐怕會成為人們的精神控制的工具的先見之明不無道理。

除此之外，先進的科技在現實中也會像電屏一樣監控人們的生活，進一步侵犯到人們的自由空間。當電子設備和互聯網成為了我們的生活必需品時，我們的生活足跡就必定會留下痕跡。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為Google的前首席執行官（CEO），他曾講過「我們知道你在哪，我們知道你曾到過什麼地方，我們或多或少知道你在想什麼。」<sup>31</sup>說明了網絡掌握我們過多的資訊讓我們在網絡平台面前近乎赤身露體。現今世代越來越多應用程式請求我們各種無關的權限，大數據分析也越來越精準，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已將自己的一切暴露於網絡面前。隨著科技發展，人臉識別逐漸普及，無論是結帳還是作為保障個人安全的監控系統皆能派上用場。然而，這種的科技看似便利，其實有助長極權的控制，亦漸漸引起市民的不安和關注。例如，2020年華為測試了人臉辨識系統，系統在偵測到吾爾族臉孔時會自動向政府發出提醒，惹來爭議。<sup>32</sup>無疑人臉偵測等新興科技會比電屏更侵犯隱私的存在，反對者的行蹤、思想、財富都能被統治者所掌控，更容易達到歐威爾口中「如果一個反對勢力可能連夜遭到殲滅……甘地的這套方法（鼓吹以非暴力方式抵抗日本）不知行不行得通」<sup>33</sup>的假設，在科技的監控下，意見不同的聲音能輕易被抹去，所以極權亦更容易可以排除異己，鞏固自己的政權。

---

<sup>29</sup> 〈自由世界裏失控的仇恨 Facebook緬甸野蠻生長史〉《BBC News 中文》，2018年9月12日，摘取自：<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5494444>，摘取時間：2023年2月21日，16:05

<sup>30</sup> 〈Google欲向中國妥協進行自我審查 引數百名員工抗議〉《BBC News 中文》，2018年8月17日，摘取自：<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5219645>，摘取時間：2023年2月21日，16:10

<sup>31</sup> Thompson, D. (2018, March 28). Google's CEO: 'The Laws Are Written by Lobbyists' The Atlantic.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0/10/google-ceo-the-laws-are-written-by-lobbyists/63908/>

<sup>32</sup> Harwell, D., & Dou, E. (2020, December 8). Huawei tested AI software that could recognize Uighur minorities and alert police, report says.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0/12/08/huawei-tested-ai-software-that-could-recognize-uighur-minorities-alert-police-report-says/>

<sup>33</sup> 同註 1，〈關於甘地的幾點感想〉，頁65。

## 第六節：總結

《1984》中的語言禁制不只限於我們明面看到的硬性規定，還有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讓人避無可避。監管民眾接收和輸出的資訊，使他們思想統一化固然可怕，但是強硬的手段反而讓人易於警覺、能加以防範，所以溫斯頓他們會以分期聊天的方式避人耳目。同樣地，削弱語言的藝術性對於避免激起人民的散發性思維是必要的。然而，溫斯頓仍能從無產階級身上學習到有批判政治意味的童謠。可是在情感控制方面，大洋國則是軟硬兼施。他們對於個人情感方面有嚴厲的管制，禁止家人、朋友、情人之間情感的發酵，避免個人勢力滋長。但同時亦會大力煽動感情，使黨員縱使有無覺醒都不可置身事外，必定無意識地附和支持黨、厭惡敵人。此外，共和國也以優化語言為由重新設計詞語，儘管沒有硬性規定強迫使用，但因以高尚的理由包裝語言控制的手法，而受人擁戴。過程中，他們改變字詞的意思、訂立抽象名詞，將政治思想灌輸進語言中，也閹割語言以收窄思想自由，侷限了黨員的思維模式。因語言是生活的必需品，不但難以察覺其中的控制，更是難以分割、保持自我，步步達到精神上的監控。

而控制的效果則是逐步建構出謊言形成的世界，讓人們分辨不了真假，進而漸漸失去批判性及個人思想，反抗意識也會隨之變得薄弱。最後，在語言禁制和思想改造中拋棄人最基本的道德廉恥，成為極權統治者的工具。

因意識到語言的衰敗是會在無形中影響到思想，所以歐威爾警惕人民小心使用基本英語、濫用外來詞、縮寫等，亦欣賞不使用新語的無產階級，在一個極惡的世界將希望隱藏在純樸並使用最原始語言的人們之中。另外，歐威爾結合時代中的廣播新科技，反省科技的進步會助長極權抹殺多元聲音。在現今社會正處於這種困境，科技的滲透使精神控制步步逼近，資訊控制、仇恨言論輕易傳播、隱私被侵犯已成常態；唯有我們心中長存《1984》的尺子，時刻自我警醒，警惕生活種種語言控制，方能保持智識。

全文完

## 參考資料（按年份排序）

### 1. 專著

- 1)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張弘瑜譯：《我為何寫作》〔Why I write〕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 2)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徐立妍譯：《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 3) 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著，印芝虹譯：《第三帝國的語言：一個語文學者的筆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 4) 塞繆爾·早川（Samuel Hayakawa）、艾倫·早川（Alan Hayakawa）著，柳之元譯：《語言學的邀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 2. 書評

- 1) 黃華：〈納粹語言如何顛覆智識？--評克萊普勒《第三帝國的語言：一個語文學者的筆記》〉。《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145期（2014年10月），頁123-131。

### 3. 英文

- 1) Zajonc, R. B. (2001). Mere Exposure: A Gateway to the Subliminal.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6), 224 – 228. <https://doi.org/10.1111/1467-8721.0154>
- 2) Joseph. *Language and poli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4. 網上資料

- 1) 〈自由世界裏失控的仇恨 Facebook緬甸野蠻生長史〉《BBC News 中文》，2018年9月12日。摘取自：<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5494444>
- 2) 〈Google欲向中國妥協進行自我審查 引數百名員工抗議〉《BBC News 中文》，2018年8月17日。摘取自：<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5219645>
- 3) 李志中〈言論自由的叢林法則（上）〉《思想坦克》，2021年1月25日。摘取自：<https://www.voicetank.org/single-post/2021012501>

- 4) Thompson, D. Google's CEO: 'The Laws Are Written by Lobbyists' The Atlantic.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0/10/googles-ceo-the-laws-are-written-by-lobbyists/63908/>, 2018, March 28.
- 5) Harwell, D., & Dou, E. Huawei tested AI software that could recognize Uighur minorities and alert police, report says.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0/12/08/huawei-tested-ai-software-that-could-recognize-uighur-minorities-alert-police-report-says/>, 2020, December 8.
- 6) Parler - Apps on Google Play. (n.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parler.parler>